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逐鹿与争鸣

东 · 周 时 期

河南博物院 编



科学出版社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逐鹿与争鸣

东 周



河南博物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鹿与争鸣:东周时期/河南博物院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6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ISBN 978-7-03-053178-0

I. ①逐… II. ①河… III. ①文物-考古-河南-东周时代
IV. ①K87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8194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范雯静 / 责任校对:彭涛

责任印制:肖兴 / 书籍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4

字数:308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田 凯

委 员 田 凯 杜启明 丁福利 张得水
翟红志 刘 康 李 琴 武 玮

主 编 田 凯

副主编 张得水 武 玮

《逐鹿与争鸣——东周时期》编委会

主 编 李 宏

副主编 刘 璐

序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是结合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而编著的，目的是为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原历史文化，更深地理解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

河南博物院自1927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近90年，其陈列体系在1949年以前基本为器物展示。由于历史研究的欠缺，特别是考古资料的匮乏使之不能完整地梳理中原之历史文化。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通道，陆续有《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中国通史简编》等出版，为历史陈列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及文献资料不能直接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只有更多的考古等实物资料才能构成博物馆式的对历史的解读与展示，才能让公众在博物馆参观获取对历史文化的直观认识。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考古的先河。1931年梁思永主持安阳后岗发掘时发现了仰韶、龙山、商代文化层的叠压关系，首次理清了三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之后河南重要考古发现不断。特别是1949年以后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和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郑州商城、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洛阳汉魏故城、开封宋城的发现发掘，信阳楚墓、浙川楚墓、三门峡虢国墓地等的发掘，荥阳、巩义、南阳瓦房庄等冶铁遗址的发掘，禹州、汝州、宝丰、鹤壁等众多瓷窑遗址的发掘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遗迹、遗物的发现与研究，使用遗迹、遗物表现历史文化有了基础。

在不同时期考古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举办了“河南历史”展览，60年代举办了“河南历史陈列”，“文革”期间一度停顿，80年代弃掉了阶级斗争的主线，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进入90年代后，博物馆人意识到文物、遗址不能完全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于是许多博物馆纷纷举办以文化为主线的历史陈列。1998年，随着河南博物院新馆的开放，以“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为主题的陈列应运而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文

物”同样不能反映文化的全貌，只能反映文化的特征与局部，加之我们希望通过陈列反映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陈列突出文化之光。2009年在河南博物院陈列提升工程中，进一步将主题“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改版为“中原古代文明之光”，把现代行政区划的概念替换为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区域的概念——“中原”。

陈列展览是建立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陈列展览的背后有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然而陈列中对文物、遗迹和历史文化的解读受展厅展线的局限。本丛书编写有三个目的：一是将陈列过程中收集的大量资料，通过图书的形式整理出版；二是加深公众对展览的了解；三是以图书的形式让陈列的内容走出展厅，传播更远。

本书大体上按照陈列的体系编写，但是为了脉络更系统、更完整，补充了陈列上不宜表达的内容。我们力图通过本书说明中原重要的历史地位，展现中原考古的重要收获，突出中原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就。虽然是沿着历史的轨迹写文化，由于是配合陈列而写，所以不免带有博物馆陈列的局限。

“中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概念，通常意义上的中原基本涵盖了今天河南省的范围，这也是中原的主体地区。两千多年前，这里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为“豫”，且有“中州”、“中原”之称。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中原素来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地区，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多发生在这里，重要人物多出现在这里，历史与文化遗存多保存在这里。

1900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1925年，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讲稿）》中提出四大文明“比而观之，中国独寿”，认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1970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2003年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都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发源地之说，也有学者加上了古希腊，认为是五大文明古国。无论是四大文明古国，还是五大文明古国，华夏文明的独特地位，始终不得撼动。其他文明虽有部分成果延续，但是从文字、语言、宗教、制度乃至祖统等方面一脉相承者，唯有华夏。中原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缩影，中华文明延续不断且文化传承最系统的区域就在中原地区。这也是本书及展览体系中重点阐明的问题。

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先民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前，河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相继出现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多元并进”的文化格局。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后，殷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北宋等20个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众多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今洛阳、开封、郑州、安阳、许昌等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其历史绵延不断，其文化一脉相承。

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化的每一次进步，王朝的每一次更迭，伴随的都是人类族群的流动和族群的汇融。几千年来中原就像一条巨河，在流经处不断汇入小溪，从而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基本认同，即对华夏民族共有祖先和姓氏根脉的认同。中华姓氏多源于中原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原发现的郑、虢、陈、黄、蔡、沈、曾、唐、申、吕、许等众多先秦诸侯国青铜器铭文为姓氏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是文化的载体。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之后金文、籀文、小篆、隶书、魏体、楷书等构成了中国文字历史的长链。翻阅历史，您会发现秦朝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创小篆，东汉召陵（今河南漯河）人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三国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繇被称为“楷书鼻祖”。中原大地遗留的大量碑刻墓志、名家墨迹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文字还是人类思想、活动、情感的表达。不仅传承文脉，还可记载历史：周文王在羑里城推演八卦；老子李耳于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为推广儒学，汉代人在洛阳建太学，并且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陈于堂前；范曄著《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二程在登封嵩阳书院教授理学等事件均可佐证。

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另一重要成就，也是文明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一。中原地区在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发现有距今4000多年前的青铜遗存，这与中国最早使用青铜制品的时代基本一致。重要的是在二里头发现的铜鼎、铜铃、铜斚等最早的青铜容器。中原先民将青铜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郑州商

城、安阳殷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之精美无疑领先于当时中国青铜铸造业。南阳淅川下寺出土之王子午铜鼎、禁等一批青铜器局部为失蜡法铸造，开中国此类青铜工艺之先河。在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发现的玉柄铁剑，其剑身由铁包裹铜芯，铁的成分为渗碳钢，是由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这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此外，在郑州古荥、南阳瓦房庄、巩县铁生沟等地均发现冶铁遗址，许多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原之核心地位之建立除却地理之优势，文化之先机，更有赖于科学与技术之先进。在舞阳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中出现了水稻的栽培、猪的驯化、狗的驯养以及最早的酒。这里无疑是当时最发达的区域。农耕社会“天时”与“地利”是维系国家的命脉。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上有多种星象图案，说明6000多年前人们已经注意到星象与自身的关系。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天文历法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天文历法的国家制度。汉代张衡于洛阳灵台主持天文观测，研制浑天仪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首次科学测量地球子午线，并制定《大衍历》。宋代苏颂研制水运仪象台，将观测、浑仪、报时集为一体，水运仪象台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钟。汉代毕岚作龙骨翻车，三国时马钧进行改良，极大地提高了农田灌溉效率。好的收成，还要有好的储藏，国家粮仓是政权维系的重要支撑。洛阳之含嘉仓、回洛仓、巩义之兴洛仓、浚县之黎阳仓均是中原重要仓储。农桑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命脉，中原不仅是农业之核心，还是桑麻之要地。相传黄帝之元妃嫫祖发明养蚕。与之对应，郑州荥阳青台遗址发现距今5600多年前的丝织残片。采桑是周代国家礼制中的重要仪式，《诗经》中有多处中原列国的采桑记载。自原始社会至宋代，中原一直是国家丝绸的主要供给地。《唐六典》分绢为八等，前三等多在中原。中原在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原始瓷，郑州商城、洛阳西周墓均发现有原始瓷。南北朝范粹墓中发现有较早的白瓷，特别是带绿釉之技术，开三彩工艺之先河，而李云墓中的青瓷为当世北方青瓷之标杆。张盛墓之成熟白瓷是隋代之代表。唐宋之际中原有众多瓷窑遗址，安阳相州窑、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窑以及著名的汝窑、钧窑、官窑，达到了瓷业的高峰。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离不开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这三教中，“儒”、

“道”为本土文化，“释”为外来文化。儒学源自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文化，周立国后周公依殷旧制改为周礼，这种原始礼制的萌芽及夏商之礼在中原普遍存在并为核心。西周中期，逐步形成等级严密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体现在贵族祭神拜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所使用礼器数量与规格上，即所谓“藏礼于器”。河南发现的西周封国遗存，正是西周礼制的物质表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贵族墓地，以及上蔡、淮阳、信阳、南阳等地的西周墓葬出土了大批反映西周重要史实的器物，它们为研究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及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并且到达过洛阳。孔子周游的列国多在中原。汉代开始历朝将儒学奉为正统，并设太学进行传扬。洛阳汉魏故城之太学遗址及开封宋代太学均出土有石经。道家尊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中原作为道家的源地遗留许多典故与遗迹。相传周灵王太子王子晋在嵩山随偃师缙氏修道驾鹤升仙，后来武则天路过此处，立下《升仙太子碑》并亲自撰写碑额。秦朝祭祀嵩山建有太室祠，汉武帝时游嵩山进行扩建，这就是现在的中岳庙；唐朝茅山宗十一代宗师潘师正曾居山中逍遥谷修道二十余年，高宗曾为其诏建崇唐观；武则天在嵩山封禅并举行投龙活动，其投龙金简在峻极峰被发现。嵩山不仅为儒学传播地，还是道教圣山，同时是佛教圣地，大约在东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派大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遇摄摩腾、竺法兰，并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邀至洛阳，敕令建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北魏时，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面壁十年始传禅宗。同样在北魏，孝文帝弘扬佛法陆续修造巩义石窟和龙门石窟。武周之时，武则天又在龙门石窟加增卢舍那等巨佛，成为天下石窟之大观。自北魏至唐宋之时，佛教在中原形成了蔚然之势，开始了汉化与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佛教与儒、道互通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景观。

佛教的传入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密切关系。西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东汉时（73年）又派班超出使西域，汉和帝时（97年）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辗转到达波斯湾。至公元166年，大秦派使节到洛阳，首次实现国家间的往来。至此，洛阳成为丝绸之路新的东方起点。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不仅实现了货物经济的往来，

而且在文化、技术等方面相互促进和影响。丝绸之路于隋唐之际达至盛期，这又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联。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达涿郡，贯通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使洛阳成为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交汇地。文化正是在这种交流中发展与繁荣的，经济更是在流通中积累与壮大的。

文化的本质是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宗教与哲学是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决定了文化的基本形态；而文学与艺术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文化的特征与高度。中原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文学与艺术形式，并且积淀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形态。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多年前的七孔骨笛，可吹奏七声音阶，其音乐的表达水平超出了同时期其他区域，更超出了过去人们对这一时期音乐水平的普遍认知。“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新石器时期的陶鼓、陶埙、牛角、陶铃和粗糙的石磬等的发现，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基本的音乐情况。先秦时期二里头发现的青铜铃开启了编钟类乐器的先河。之后安阳发现的商代铜铙以及虎纹石磬、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编钟、浙川下寺出土的二十六枚甬钟、新郑出土的郑国歌钟等构筑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风貌。汉代杂技歌舞俑、南北朝范粹墓出土的胡腾舞扁壶、张盛墓的坐部伎乐俑、唐代的各类舞俑、宋代的杂剧雕砖等，清晰地再现了中原地区乐舞艺术的发展脉络。其中坐部伎、中国戏曲艺术的源起无疑与中原有紧密的联系。歌以抒情，文以载道。中原诗歌自《诗经》至于汉赋、唐诗、宋词，无不浸染着中原人文的风尚。以蔡文姬、建安三曹、杜甫、白居易、韩愈、岳飞等为代表的文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似群星辉耀。而绘画艺术方面，仰韶彩陶、汉代画像和壁画展现了中原地区古人的天赋，吴道子、荆浩、张择端、宋徽宗等多有先启之功。

中原地区因环境优越而孕育人类、汇聚人口，因人群的流动而带来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文化与技术的先进是这一区域成为物质生产主要地区的保障。中原数千年来核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的终极原因也在于此。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明呈现不同的风貌和特质，但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原始社会的文明之奠基与初创，先秦之礼乐，两汉魏晋南北朝之融合与转型，隋唐之强盛与成熟，宋代之人本与细腻，既是中原文明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的主体特征。中原文明的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局部，

同时体现在整体。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虽然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表现的是闪光点，但是本书还是力图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内在信息和发展变化过程。了解中原文明向心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根源，了解中原文明质朴性、包容性、秩序性的构成与关系，以及中原文明之于华夏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当然中原文明的诸多方面还在探索当中，许多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和解读。对于重要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在展览中我们已经通过展板的形式向公众作多种介绍，本书也以这种方式进行编写，以期让公众理性地和相对地了解历史与考古的科学性。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的筹备工作和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指导与支持，也得到了河南省和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的支持，包括提供文物与图片、提供考古资料与信息，在学术上提供指导与思路。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感谢！由于学术研究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献资料收集的不完整和研究深度的欠缺，以及在历史、考古、文化等方面认识上的高度、广度的局限等，本书不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完善之处，在此，真诚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对书中解读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田凯

2016年8月

目 录

概 述	001
第一章 周王室东迁与洛阳东周考古	
第一节 天下共主与东周王朝的衰微	012
第二节 洛阳东周考古	016
第二章 东周列国历史与文化	
第一节 天下枢机——郑国与卫国	029
一 郑国历史	029
二 卫国历史	044
第二节 汇融夷夏——中原楚文化	052
一 楚国都城建制	057
二 屈原与楚辞	057
三 中原楚文化考古	057
四 楚国货币	078
第三节 南北交融——汉淮诸国	081
一 汉淮间诸国形势与源流	081
二 汉淮间诸国文化与考古	083
第四节 三家分晋——中原三晋文化	105
一 三家分晋	105

二	魏国历史	107
三	韩国历史	120
四	赵国历史	130
第三章	中原逐鹿——两周战争与会盟	
第一节	东周军事思想与盟誓制度	138
一	军事思想	138
二	盟誓制度	140
第二节	中原东周兵器与战车	143
一	兵器	144
二	车马器	155
第四章	百家争鸣与中原诸子	
第一节	士的崛起与百家学派	171
一	“王官之学”的私化	171
二	“士”的崛起	172
第二节	中原诸子	178
第五章	秦并天下与中原秦文化	
第一节	东进中原以并六国的历程	196
第二节	中原秦文化考古与文物	200
后记		213



概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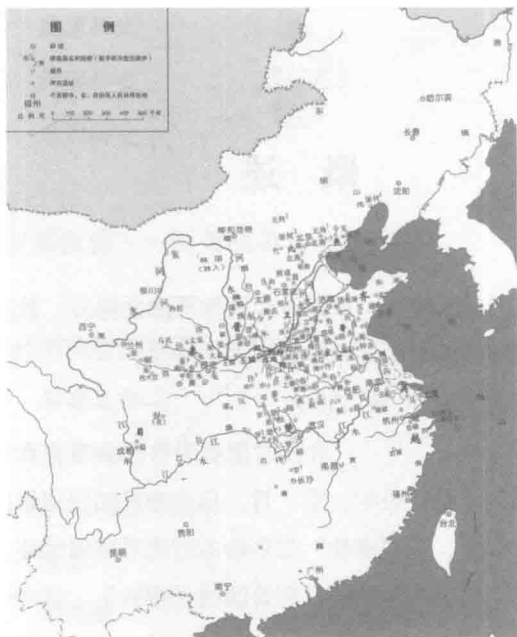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东周时代的帷幕由此揭开。此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新兴势力更迭不断，列国文化异彩纷呈。

东周，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约550年。

“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1]。春秋时期是因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古代史官记录本国发生的大事时，是按照年、季、月、日的方式加以记录的。一年四季尤以“春”、“秋”二季最为重要，以“春秋”二字命名的史书就表示逐年记载四季之事。当时各国均著有《春秋》，而流传至今的只有鲁国的《春秋》。该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计242年，大体上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段特定发展时期相当，故历代史学家就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东周前半期的名称。

“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2]“战国”一词最早源于司马迁所著《史记·匈奴列传》，原本是指各国间征战不休之意，而用以指代战国时代则始于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战国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3]东周后半期，七国争雄、硝烟不断，“战国”便成为这个时代专有的代名词。根据《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战国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为止。

历史学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变革异常激烈，经历了五个半世纪从统一走向分裂，由兼并再度统一的历史进程，生产关系重新整合，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代表周王室经济垄断体系的“井田制”渐遭破坏，大片荒地得以垦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田”；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深受重视；冶金、盐业、纺织、日用竹木漆器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商业及城市经济也日渐活跃，并出现了金属货币广泛流通的现象；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最早一批人口集中的工商业城市已经出现。经济的变革，引发了政治结构上的大动荡、大分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春秋中原列国形势图

(参考来源:《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的宗法分封制度越来越失去其社会支配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国王为中心的郡县制,以贤能为标准、按功爵定等级的用官制度逐渐替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度。

春秋前期,以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迅猛崛起。他们广占“私田”,发展经济,招揽人才,扩充军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4]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5]的局面所代替。随着诸侯国内一些卿大夫势力的发展,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一些国家的卿大夫控制了各国的政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被“大夫专权”的局面所代替,出现了“陪臣执国命”^[6]的现象。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引起了法律制度、赋税制度、兵制等的变革。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120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2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有其中12个国家的世系,分别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这些国家活跃在春秋历史的舞台上,相互之间展开了以争夺土地与人口、掠夺财物为目的的一系列争霸战争。据鲁史《春秋》记载,

243年间共有36位君主被弑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朝聘及盟会450余次。在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中，主要是齐、晋、楚、秦四国，宋国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霸业。至于吴、越两国争霸已至春秋晚期，且仅局限于东南一隅，对中原地区影响不大。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还有越国是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卫、中山、鲁、邾等。另外，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义渠，南有巴、蜀、越等少数民族分布。此时，植根中原大地的华夏诸国与周边民族逐步融合，中华民族的主体业已形成。作为诸侯逐鹿的主要舞台，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中原方国、氏族及诸侯封国，达百余国之多。数十年来，河南考古发掘和勘察的两周地上古城遗址，多达近150座，占全国同时期古城遗址的四分之一还多。人口密集，城邑栉比，战乱频仍，中原处于四方诸侯拓土开疆、图霸天下的中心，许多著名的战役在这里进行，许多改变历史的抉择在这里酝酿。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7]。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被史学家称为“春秋五霸”，形成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两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事实上，足智多谋的郑庄公、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制霸中原的晋文公、独霸西戎的秦穆公、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纵横江淮的吴王阖闾、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皆可堪称“霸主”之名。

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几乎都卷入战争之中，兵连祸结、无有宁日。在此背景之下，出现了旨在停止战争的“弭兵运动”。所谓“弭兵运动”，是由经常处于交战状态的宋国发起的，前后共有两次：一次是在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发起，后因楚国撕毁盟约而没有成功；另一次是在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发起，会议确立晋、楚两国同为盟主，除齐、秦两国外，其余的小国要同时朝见晋、楚，并同时向两国纳贡。第二次弭兵大会牺牲小国利益，使得晋、楚平分霸权，以此取得了成功。此后40年间，晋、楚两国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争，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告一段落，这对发展经济、安定生活大有裨益。

经过春秋时代300年的兼并，大部分中小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嬴姓秦国、田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芈姓楚国和姬姓燕国这七国最强。谓“战国七雄”。战国的历史以这七个大国为主线展开，征战的中心就在今河南省及其周边。变法图强，群雄逐鹿。为适应时代的需求，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拉开了战

国时代新一轮群雄逐鹿的大幕。

战国前期，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相继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同时，随着数以百计的小国整合为十多个大国，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大国不得不面对残酷竞争的格局。在激烈的相互攻伐中，如何富国强兵成为各国决策层首要考虑的问题。战国后期，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变法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首先通过变法称雄中原的是魏国。魏文侯任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悝为相实施变法。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汇集诸国法律编成《法经》，维护社会秩序；建立“武卒制”；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种种举措，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春秋战国之交，晋国世族赵氏两代宗主努力经营中牟（今河南林州境内）。在赵襄子的刻意经营下，中牟城内近半数的人家“弃田耘，卖宅圃”，“向学”之风盛行，使得中牟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公元前425年，赵献子继位，徙都中牟。作为赵国与各国诸侯逐鹿中原的政治中心，中牟历经献侯、烈侯、武公、敬侯三代四主，长达38年之久。这个时期，正是赵国完成政治改革、加紧军事扩张、争霸中原的关键时期。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河南荥阳人申不害为相，变法图强，进行了一系列以“术”为特征的政治改革。一是改组、整顿官吏队伍，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以此为标准衡量、选拔人才。二是强化对官吏的考核、监督。此外，通过改革军制、建立新军，使韩国实力大大增强，“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8]。

公元前401年，楚悼王继位，任用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裁减冗官，选贤任能，明法审令，整顿吏治，禁止私门请托。在悼王的支持下，变法推行迅速。七年变法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楚国很快强盛，“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9]，几乎与秦、齐成鼎足之势，并一举打败了魏国并出兵伐秦，呈现出“诸侯患楚之强”^[10]之势。

公元前314年，燕国因内乱遭受齐军的侵略。齐军撤出后，在韩国（今河南新郑）为人质的燕国公子职回国继位，这就是燕昭王。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11]，得到了邹衍、剧辛、苏秦、乐毅等人的辅佐，修法令，使燕国一度强盛，几乎灭掉了齐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魏国人商鞅入秦，实施变法。自此，秦国进